

第八章、結論

Aristotle 在其政治學提到「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¹強調人會組成群體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如何處理群己關係，特別是群己關係中許多權力的競合，就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處境，這導致人受到各種權力深刻的介入，從而使人與政治成為一體兩面，成為一種政治動物。時至今日，Foucault 指出「19 世紀的一個基本現象是，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權力負擔起生命的責任。」²權力將目光更集中於人的身體，權力呵護身體，調動身體的力量，至知識經濟時代，身體與權力的結合更為緊密。

結論部份，首先，針對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看法與出未來的研究策略。第二依照本文所建構的身體政治學與論述網絡，針對人民與政府關係，以及知識分子自我定位與生存策略進行思考。因為文化研究途徑代表了研究者不能僅是靜觀，也要積極思考研究活動對自身的可能意義，以求有助於實踐。而這番思考與陳述，也是揭示研究者撰寫此文的論述立場。

第一節、研究成果與進一步的思考

本研究經由文化研究途徑，利用論述理論進行分析，結合第二章提出的「解構文本-多元論述-身體政治」分析策略，研究結果可分三點：

首先，解構文本方面：分析有關知識產權的相關網路文本，選擇了王同億現象、漢芯晶片造假案，爽歪歪爭議事件，它們分別是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的代表性事件，本研究由分析這些事件的相關文本，將談論它們的聲音予以拆解，以見建構它們與定位它們意義的論述立場為何。

第二，多元論述方面：經由探討多種論述立場的關係，特別是這些論述之間的

¹Aristotle 著，顏一、秦典華譯，政治學（台北：知書房，2001），頁 34。

²Michel Foucault 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226-247。

競合策略、催化機制。經分析發現，知識產權與網路審查是黨國體制為適應知識經濟潮流的自我調適，並利用它們將創意活動侷限在經濟發展、民族主義等非關黨國體制的範疇上，以免創意活動危及黨國。黨國體制經由掌握知識產權的法律與網路媒體的宣傳，吸引與主導了包括黨國為公、民族先進、經濟規範、知識創新等四個論述結盟為主流立場，這是一套中國知識經濟趕超戰略。而在威權體制加緊活動催化下，主流立場加緊活動，為了否定他者以證成自我，也就同時激發了黨國為私、民族落後、經濟無序、知識造假等非主流立場的反作用力，正反勢力互相激化，以致知識經濟時代下大陸的文化圖像呈現出威權體制引導下的眾聲喧嘩之景。不過也必須強調，因為國家介入，以及知識經濟與網路媒體促使資訊快速流通，反覆播送類似的立場，導致這兩個立場成為討論知識產權事件的限制性框架。

第三，身體政治方面：知識經濟與現代國家都是向身體的回返，知識經濟與現代國家兩者的匯合即為知識產權概念，知識產權對身體的作用即為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而知識產權是多元論述合謀下的結果，是故此一身體政治學表現為多元力量多方驅動人的精神、意識為身體服務，最終使身體得到滿足、延伸，民族國家也因此得到證成。此一身體政治學是一種身體與國家協商的結果，雙方均經由從屬於此一身體政治學而在其間得到能動性。在威權體制的大陸，國家的力量運作顯然較為強勢、集中。至於身體解放的可能性，則只有在身體漂移在多元論述之間的片刻才得以實現。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因符號的意義生產在各方驅動下更形熱烈，也就提高了人游走在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與速率。

總的來說，本研究認為大陸社會在知識經濟環境下的表現是：黨國體制利用法律與宣傳主導、催化多元論述競合，以驅動對威權體制不具批判性的創意活動。但所謂多元，並非意義的無限制內爆，它們是限定在民族、黨國、經濟、知識等幾個固定框架。且此一競合產生的知識產權生產，或相應而生的偽劣假冒活動，均會被收編以有助國家主導的主流價值的再生產，但基於民族國家和公民身體的辯證統一，主流價值的再生產亦即身體得到照顧與伸展。雖然因為威權體制，致國家較身體享有更大能動性，但在威權體制集中施力的情況下，也將驅動符號的意義生產更形熱烈，提高了人游走在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與速率。簡言之，本研究認為知識經濟的環境，創造了一個國家與身體在知識產權論述的中介下，緊密鑲嵌，相依並存的關係。而大陸社會在知識經濟下的身體政治學，是包括國家提取身體力量之學，國家滿足身體須要之學，也是身體於從屬中取得能動與解放之學。

綜合以上，本研究的論點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 1.知識經濟時代下人的處境是面對一個知識經濟、民族國家、身體欲望互為鑲嵌、互相協商的身體政治學。
- 2.此一身體政治學是以知識產權作為知識經濟、民族國家、身體欲望三者交會的介面，而以身體欲求的滿足與延伸為共同目標。國家主導固家框架的多元論述共同建構的知識產權，加速催化人進行合於主流的創意活動與非主流的另類實踐，身體欲望亦在此過程中得到驅動與制約，知識經濟、民族國家亦隨之得到證成。
- 3.固定框架的多元論述提供人進行不同連結的機會，是人進行主流、非主流實踐與漂移在論述之間的可能性所在，它是人的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前提。

本研究的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 1.調和並修正了 Foucault 與 Agamben 的觀點，認為國家與身體均享有從屬於現代國家身體政治學的能動性。但在中國大陸，相較國家與身體，國家顯然享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 2.知識經濟下的現代國家，經由知識產權觀念調動意識對符號的無限創意，以服務身體，可視為 Nietzsche 以來強調回歸身體的重大表現。
- 3.相較於 Agamben 將身體的權利與權力來源訴諸國家與身體的辯證統一，本研究發現，人亦可與國家之外的知識經濟語境、網路空間建立連結，顯見身體在知識經濟時代建立跨國界連結的未來發展空間。
- 4.綜合以上各點，本研究在文化研究結構與能動性的爭論中，傾向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國家與人在身體話題上彼此協商，各自取得能動的空間。
- 5.進一步反思中國研究的特殊性，本研究認為，知識經濟、知識產權它們在中國也會順著國家與身體互為鑲嵌的邏輯展開，此為中國研究特殊理論意義的所在。

- 6.在上述觀點下，人的能動性與解放機會在於：商品經濟雖然為了求自身的再生產，將身體建構為具有無窮欲望，並經由知識產權調動多元論述來刺激多元創意與欲望，但人也彈性的運作這些建構，導致國家與商品都必須求新求變，為滿足身體欲望而不斷微調，此即身體的能動性所在。而身體的解放，則只有在身體擺脫從屬於論述的地位，漂移在多元論述之間，意義消失、無所認同的時刻才得以實現，多元論述的框架正提供了身體一空倚傍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認為，人的能動與解放是一個零敲碎打的工程，它不可能一次到位，身體是同時享有從屬性、能動性、解放性的機會，這些機會更因知識產權的催化多元論述而增大出現的速率。
- 7.最後，有關網路傳播的特性問題，由本研究來看，網路傳播的訊息高速、廉價複製特性，主要是有助既定的幾個論述框架的強化，而不是導致意義內爆與無限創意。網路傳播的訊息高速、廉價複製對人的能動性與解放的意義應是在經由不斷重複幾個既定框架，而增加不同框架進行新連結的機會，或因新舊文本並存，提供文本被誤讀、錯接的機會。簡言之，網路媒體同時在強化既定框架，也在催化著跨界連結的可能性，它既在強化主流立場，也在為非主流的另類實踐創造機會。

依據以上的結論，可進一步提出關於文化研究的論述理論分析策略，可供未來研究參考。本研究提出一個由民族、黨國、經濟、知識四個面向，每個面向自成一組二元對立的多元論述網絡構成的眾聲喧嘩文化圖像。用於研究，它可以是一個文化拼圖，這八塊拼圖隨著建構不同的符號有不同的組合形式，它是一個多變項、多關係的分析模式。³

首先，文化此一能指，其所指並非一個或多個意義或概念，而是一個作為意義產生器的多元論述聯動網絡，它是一個意義生產程式。論述依相反相成的方式成套的出現，不會單獨存在。所謂多元論述聯動網絡意即某一論述存在時，作為其對立面的論述也同時存在，兩者或多者之間相依共存。而在正反論述互相競合之際，論述的內容、邊界不斷變化，因此論述具有不確定性。在此論述制約下的意義，與憑藉意義而生活的人，其實是處在「具有產生不同連結的可能性」的論述制約之下，

³Lowell Dittmer and William Hurst, "Analysis in Limb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mid the Maturation of Reform,"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4 (2003), pp. 11-48.
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h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it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33-360.

也具有展現「進行不同連結的可能性」的機會。

其次，有關社會行動者「能動性」的表現，可分以下幾方面說明：第一、它是社會既有論述提供與限制下的意義選擇、意義連結空間。第二、多元論述的互動、連結是多義性的來源與限制，多義性為能動性的選擇活動、互文性的讀寫創造了條件，能動性的多寡與論述的多寡成正比。第三、落差較大的論述之間，將創造更大的能動空間。

最後，當多元論述聯動網絡之中包含有知識經濟因素時，知識的資訊化、商品化，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後，因知識的快速生產與流通，將激化此一網絡。知識的快速生產與流通有助多元論述的建構、傳播與活潑化，增加能動性的空間。若多元論述聯動網絡之中包含有國家權力因素時，國家權力的大小、活潑程度與此一網絡內部活動的激烈程度成正比。

關於以上的文化研究與論述理論分析策略，可再說明幾個問題：

1. 以上所述並非站在本質主義立場，即多元論述聯動網絡本身具不固定性，並非後設敘事、先驗律則，它是研究者在其代言的某一論述背景上，在相關論述的促動與制約下，對文化圖像進行的一種解讀。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背景論述參照下，建構出不同的論述網絡。在各方的研究實踐中，文化圖像與人永遠處在未完成狀態，互動中不斷豐富彼此內涵。⁴
2. 論述透過他者來證成自己的能動性，進行意義的生產，但也要受他者的制約。對個人而言，它代表了人要能動的回應環境制約，並在其中活出自己。可再進一步探究的是，人作為論述的代言者，其能動性若只是表現在論述間進行連結、互文性讀寫，那麼所謂的創新，其實僅是傳統的回潮與變體。⁵

⁴尚須指出，人是在什麼論述基礎上對一現象進行參與觀察，其立場亦可以流動，可以多元化。如研究者可站在國族認同、職業認同、性別認同等等不同立場，去探討依不同的認同座標產生的各種不同種類問題，並採取不同的參與觀察方式。特別在全球化的空間觀、結構的多元因果觀等立場上，促成了人在生命領域中進行千里一瞬、古今相接、游走虛實的？物線式、跳躍式穿梭旅行的無限可能性。請參考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頁 2-23。

⁵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 198。提到歐洲治理麻瘋病、瘟疫的經驗，成為禁閉與規訓的原型，但問題是治理麻瘋病、瘟疫的方法，又是自何處得到啟示？

3. 意義是作為人與世界接觸的介面，從而使得符號、文本的讀寫與實踐活動得以進行。換言之，可反求符號、文本、實踐的意義，由意義再通向多元論述，並分析各個論述的生成變化。由此觀之，每一個符號的生命史，均可以是一個研究主題。

以上一研究結果與構想，並非是「宏大敘事」而是基於本研究的解讀策略，經由作者與文本對話後的結果，並基於表述的須要，所進行的概括與化約，它無法代表社會的全貌，更不是社會本真的規律，此一文化圖像只是解讀文本的一種方式，是在特定角度上對社會的素描。在此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們須要的是更多解讀策略的彼此進行更多的對話與爭辯。⁶

第二節、知識經濟下的生活實踐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使得人民與國家之間，各自從身體的話題取得能动性、正當性。如大陸的物權法與反壟斷法兩部爭議性多時的市場經濟支柱性法律，即是一例。物權法醞釀了七年，至 2007 年 3 月的第十屆全國人大才告通過，它的爭議點在於，主張制定該法的主張是它將明確地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而且在民事法律關係中，私有財產將與國家、公有財產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反對該法的意見是，一方面有人認為該法將違反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主義基本特色。二方面有人認為在法律上肯定私有財產將為貧富差距火上加油。這幾個主張均可與身體建立連結，均是以保護身體為藉口，爭議焦點在於，究竟是要保護多數人的身體還是部份人的身體。⁷至於反壟斷法則是以保護市場競爭，防止和制止壟斷行為為目的，但該法卻爭訟二十年未能通過，爭議的問題之一在於該法可能對行政壟斷進行規範，行政壟斷是指政府以行政手段對市場的介入，它會造成限制競爭，扭曲價值規律，甚至更會對誘使官商勾結等貪腐行為。⁸可見政府在保護人民身體的目標下，仍會不時試圖保護自己的能動空間。

⁶ 陳述之，「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東亞研究，36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05-172。

⁷ 張慎思，「透視：中國物權法的一波三折」，BBC 中文網，2007 年 3 月 9 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850000/newsid_4851100/4851106.stm。

⁸ 「國務院原則通過反壟斷法（草案）」，新華網，2006 年 6 月 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6/08/content_4661181.htm。

此外，本研究提出的知識經濟文化邏輯或知識經濟的身體政治學，可視為人在多元論述之間進行博奕的文化棋盤。在王同億事件、漢芯案、爽歪歪商標爭議事件中，當事人均面對知識經濟營造的協力關係網。⁹他們在張力之間曾作出名利雙收的實踐，也曾飽受非議。王同億事件是因其所著的一般性辭書，具有學術與大眾的雙重判準，在兩者間的落差之間進行操作，甚至暴得大名，致大陸辭書界必須大聲疾呼，並訴諸法律，以正視聽。漢芯案的陳進則是面對發明的壓力與利益，由務實創新滑向了弄虛造假，遭到學校與政府的處罰，以正學風。俞建成發明的爽歪歪商標則因商標兼有的趣味易記與情色幻想而在爭議中創下銷售佳績。他們都是在一個充滿張力的情境下進行實踐，一如文化研究出現的背景在於工業化與都市化創造了大眾的自主空間與市場需求，投其所好的通俗文化產品應運而生，大眾亦能動的進行消費。從此文化出現了精緻、通俗的異質分化，造成文化不再是單一的整體，而須要被解剖、研究，文化研究即是一種張力下的實踐。¹⁰知識分子一向被歸類為從事屬於精緻文化的學術活動，面對通俗文化興起，知識分子也須相應調整角色，文化研究可以幫助知識分子建立對通俗文化的理解，找到談論通俗文化的立場與方法，以求安置自身。

知識分子對於差異性文化的實踐，有如下幾種。首先如王同億事件或漢芯案中，大陸辭書界與學術界欲透過與國家機器、傳播媒體結盟，把自己所堅持的規範轉為大眾的共同標準，希望經由更精巧的方式，或強制、或說服，使文化復歸到一定的活動範圍，此一立場可稱為精英主義，主張知識分子應維護自己傳統的立場與堅持。第二，不同於上述立場，還有所謂群眾路線立場，這種看法認為知識分子仍然站在精英的角度，但是應放寬心胸去欣賞、學習大眾文化，採取「從群眾中來，到

⁹有關大陸學界對知識分子在文化研究中如何自處問題，可參考：楊俊蕾，「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1期（2002），頁103-109。以及盧鐵澎，「文化研究：大道與歧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6期（2004），頁75-83。

楊俊蕾提到文化研究對知識分子而言具有會通高下、填平雅俗，消解社會大眾矛盾的積極意義。盧鐵澎則指出倘若知識分子擁著文化研究跨入各領域，以圖謀學術主導權，則有違文化研究謹守邊緣立場、反對霸權的本旨，將使自己淪為自己批判的對象，指出了文化研究對知識分子的可能危險。此外，石之瑜，「文化研究作為政治學的次領域：能不能？該不該？」，政治科學論叢，第18期（2003），頁1-22。則思考了文化研究應用在台灣政治學領域的必要性與開創性。

凡此，均對文化研究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與從事學術活動可能具有的意義進行了思考。

¹⁰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 43-68. 英國的工業化、都市化最早，因此文化研究首見於英國。

群眾中去」的方法，建構自己外圓內方的處世策略，由開放性來重新建構知識分子的內涵，此一立場主張知識分子應開放的修正自己的立場。¹¹第三種立場，可稱為「文化民粹主義」，主張在文化上與認同上要填平雅俗，認為雅俗之間並非不存在差異，而是區分彼此已不再重要，並承認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是不分雅俗的共同文化參與者，在參與中受到文化的制約，但同時也透過對文化的多元解讀享有能動性，並在其中開發出不同於主流的聲音，或擺脫制約的可能性，在此之間有快感，也有政治，此一立場主張知識分子應放棄自己的立場，加入群眾。¹²總之，知識分子如何在當下的語境制約下，採取適當的立場，因勢利導的發揚能動性，以求安身立命，是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的課題。特別是大陸在政治上仍然威權，社會有著不均衡的發展，知識分子在面向多元複雜的其他論述立場時，其自主性與能動性可能必須透過與各種收編的力量時而抵抗、時而合作的關係，來證成自己的存在。

知識分子在選定立場後，應採取什麼樣的生存策略，由王同億現象、漢芯案、爽歪歪的爭議，也給我們某種啟發。誠然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知識經濟時代的語境中，上述案例被判為錯誤示範或爭議事件，只能當成警惕，豈能加以學習。王同億或陳進的策略，以當前的語言來說，就是披著學術的外衣，蠱惑大眾，暴得名利。爽歪歪的創意人俞建成也被指為利用文字的曖昧空間，藉機炒作。但他們的手法也可解讀為一種由邊緣對抗中心的顛覆戰略，利用游走在多元論述的邊緣，產生不同的實踐。如王同億是一方面站在學術的邊緣，一方面站在大眾的邊緣，生產了充滿奇言怪語的辭書；陳進則是站在務實求真與務虛逐利的邊緣，以他牌晶片混充發明；俞建成則是站在純真童趣與色情幻想的邊緣，發明了爭議的商標。他們均利用邊緣的交界位置，連結不同的論述，尋求實踐的空間，引發社會的關注。¹³例如經典文學改編為倡銷連續劇，大陸社會近年的重讀古籍熱，文化研究以反學科的方法研究通俗文化，亦可歸屬於此種戰略的運用。而且此一戰略對於想走向市場逐利的知識分子、想堅守精緻文化的知識分子、想進行政治解放的知識分子，都有適用性。¹⁴

¹¹王寧，*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3），頁118-119。

¹²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pp. 199-202.

¹³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1), pp.65-71.

¹⁴吳榮鎮，「當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政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2001），頁361-384。該文指出大陸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出現階層分化與價值觀的轉變。本文以為「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知識向全社會流動，作為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亦向全社會流動，這是知識分子階層分化產生的主要原因。

在權力結構各個組成部份正在彼此激烈競合，知識分子可以經由連結不同的論述，以發揚自己的論述，作為自己的生存策略，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分子作為知識的載體，知識的快速、流動、多元的特性亦將成為知識分子的特性，使得知識分子有機會游走於多元論述之間，面對著從屬性、能動性、解放性同步增長的多維變異空間。

